

2024
年度盘点·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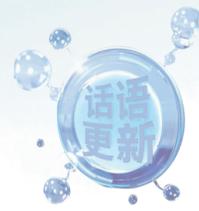
从视野拓展到话语融合

——2024年文学理论评论综述

□李 壮

◆对于文学理论评论来说,仅仅关注那些熟悉的名字、或诸多可指认、能溯源(指向经典意义上的文学史叙述)的名字,已经远远不够了;仅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纸质印刷书籍乃至纯文字文本,也已经远远不够。更多元的文学性表达、更融合的文本创造形态,理应成为关注重点

◆文学评论是一件专业的事,但专业的最终目的不是“自闭”,而是更好地、更有尊严和分量地向公共话语场敞开——我们急需那种把公理价值、专业知识、传媒表达三者结合起来的话语能力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展开体系化、学理化的研究阐释,对十年来新时代文学发展状况进行全面梳理,是2024年中国文学理论评论工作的重要内容。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盛景》,从“筑牢文化根基 造就民族复兴精神大厦”“回应时代之变 开辟文学发展广阔天地”“讲好中国故事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打造文学新力量 唱响文学的青春之歌”等方面阐释新时代文学的繁荣盛景和发展任务,强调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领会核心要义、准确把握实践要求,紧密结合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开辟新时代文学的辉煌未来”。

《文学评论》推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文学研究”笔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设立“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新时代文学”栏目,《北京文艺评论》推出“新时代中国文艺2014-2024”特稿栏目等,推出了王一川《“两个结合”与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的五种理论范式》、张江《“两个结合”是文学理论守正创新的必由之路》等文章。《文艺报》“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等专栏,刊发南帆《文学何以现代——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当代文学》、白焯《万紫千红总是春——新时代文学近十年来发展述要》、潘凯雄《文学·时代·时代精神》、汪政《新时代文艺环境与全球批评的构建》、周新民《文学资源的转向与近十年发展新态势》等文章,从不同角度梳理新时代文学的新气象、新成就、新经验,引导广大作家在新的起点上担负新的时代使命、谱写新的时代华章。

新时代文学的重要行动和重要现象备受关注。中国作协主办“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下设“新时代乡村的历史性变革与经济社会形态变化”“人的现代化:新时代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变”等九个议题,与会者围绕城乡流动、乡村振兴、新乡土叙事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文艺报》开设“向人民学习 向生活学习——繁荣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笔谈”栏目,推出了孟繁华《文学史视野下的“新乡土文学”》、贺绍俊《乡村旅游如何写出“新”与“思”》、张燕玲《新乡土叙事的返乡者形象》等十余篇理论评论文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推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研究”等重点栏目。对于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作品,《文艺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报刊进行及时的评论。

关于“新时代文学”的专题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中国作协在上海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揭牌“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并先后举办多场新时代文学主题论坛。“新时代文学”概念本身也被不断阐释,如李云雷《“新时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0期)、杨庆祥《什么是新时代文学?》和刘涛《新时代文学的五个特征》(《北京文艺评论》2024年第1期)等。许多研究者将中国式现代化命题、新时代文学发展现场有机贯通讨论,如石岸书《试论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2期)等。

“新大众文艺”与理论视野的拓展

“新时代文学”概念,离不开新现象、新文本的支撑。在传媒技术飞速跃进、文化生态剧烈转型的今天,“文学性”正持续转化、泛化,文学产能的出口和形态都在更新,文学创造的全新实践不断冲破旧有想象范式的边界,形成了强烈的“溢出”效果。对于文学理论评论来说,仅仅关注那些熟悉的名字、或诸多可指认、能溯源(指向经典意义上的文学史叙述)的名字,已经远远不够了;仅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纸质印刷书籍乃至纯文字文本,也已经远远不够。更多元的文学性表达、更融合的文本创造形态,理应成为关注重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2024年继续重点打造“泛文本研究”栏目(在年末更名为“新大众文艺研究”),正体现了这种研究趋势和问题意识。在这一栏目下,电子游戏(杨俊《执心自食,游戏“天命”——论〈黑神话:悟空〉的“矛盾”》)、CP文化(郑斌《自萌与隐退:论真人CP流行文本的生产与演化》)、科幻影视作品(李泽廷《科幻如何中国:作为文化战略的科幻电影——以〈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为中心》)等,都成为重点研究对象。同样的情形亦见于其他多家学术刊物。仅以《南方文坛》为例,该刊2024年刊出的钱文亮《AI训练、“自动化写作”与当代诗歌的现代性诗学知识》、李静《“赛先生也成了赛同志”——当代文学的科学叙

事及其思想内涵》、白惠元《妖怪政治学:青蛇形象及其边缘话语生产》等文章,都具有代表性。

这样跨领域、跨边界的理论视野和研究路径,已在近些年获得越来越多的强调和重视。但较为关键的一道难题在于,面对形形色色的“泛文学文本”和“跨媒介的文学性”,理论界长期以来还未形成较为通用的概念指称。因此,2024年底“新大众文艺”概念被集中关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延河》2024年7月上半月刊发表了《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作者署名“《延河》编辑部”),引发广泛关注。2024年12月6日,中国作协指导、陕西省作协和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联合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暨弘扬柳青创作精神、促进新时代新大众文艺创作研讨会”在陕西西安召开,会上还举行了陕西省作协、西安交通大学合办的“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12月26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共同主办了“新大众文艺:现象与意义”研讨会和“新大众文艺:文本及阐释”学术工作坊两场深度理论研讨活动,来自传统纯文学、网络文学、影视剧、短视频、电子游戏、数字媒介等多个研究领域的数十位专家,跨学科跨行业展开讨论、交流信息,围绕新大众文艺的内涵、特点与意义,大众文艺的历史脉络与最新发展,媒介变革对文化生活、文艺形态的塑造,新大众文艺对文艺观念变革的启示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文艺报》《人民日报》等纷纷推出专栏、开设栏目,刊发相关研究成果。李敬泽刊发于《人民日报》的《新大众文艺——支撑新高峰 砥砺新经典》一文写到,信息化浪潮重塑着人们的阅读习惯、观看习惯,而且在地改变着文艺主体的形态,“参与、交互,接受同时输出、模仿进而创造,这种新的主体形态正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习以为常。文艺深刻地介入生活,生活直接地介入文艺”,“一些坚固的观念和事物正在受到冲击,文艺乃至社会文化的更多重大变革正在前方浮现”。《文艺报》将“新大众文艺”与“新媒体时代”“新时代文学的文学性”“跨界写作”等关联话题列为“2024文学关键词”,邀请专家学者探讨,专家所提及的“民众的文化趣味、平民的文学理想、大众的文化权利”(白焯语)、“文学性重要的基点关乎的是感性和人性,所以,它势必外溢”(来颖燕语)等,都是基于文学、又更广阔的理论思考方向。

当然,面对新崛起的文艺现象,关注之下的省思甚至警惕也必不可少。胡一峰在刊于《人民日报》的《警惕流量至上与审美堕落》一文中提出,在“新大众文艺”的潮流中,“平台充当了传统文艺创作中‘编辑’和‘发行’的角色,对内容生成和分发产生重要影响……合理运用时,流量像一道光,照亮人们还没关注到的好内容;但若唯流量是从,则会抽空创作的精神内涵,陷入同质、庸俗的误区”。当流量和算法强力介入文艺生产传播,怎样调和“艺术价值与流量价值的矛盾”,是值得思考的重要命题。相似的命题还包括,我们如何在“泥沙俱下”与“披沙拣金”之间、在“即时参与”与“长留经典”之间求得良性的平衡。

环境更新、话语更新与代际更新

关于“流量”话题,值得关注的文章还有何言宏发表于《文艺争鸣》的《当前文学中的流量文化》。文章认为,文学的“流量化”是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最新转型,它创生了写作的平权,但话语暴力、观点偏激、信息“圈层化”等问题也相伴而生,我们真正的目标应是“重建个体、重建公共性”。可与之对话的是文学界热议数年的“出圈”话题。2024年初,《人民文学》走进“与辉同行”抖音直播间,首播4小时杂志成交额达到1785万,成为文学圈内轰动一时的焦点事件。随后《收获》杂志以同样方式再次引发关注。文学的“破圈尝试”、不同话语系统的对接对话问题,衍生出不少相关理论探讨。当然,这种探讨绝不是简单的“捧场”“领掌”,而是显示出举一反三、严肃真诚的问题意识。徐则臣从“带货”谈到了“带转型”：“不能是报刊出了编辑部就万事大吉了,这只是生产流程的上游,还有中游和下游。你要推广、宣发,要让你刊发的内容实现尽可能有效的阅读和尽可能多形式的艺术转化”(《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学报刊何去何从》,《文艺报》2024年12月30日)。何平《必须保卫文学圈子》一文(《小说评论》2024年第2期)曾引起颇多讨论:“出圈”的是怎样的文学成色?输出到了什么?抵达哪儿?这些问题,应该需要仔细辨识的。”我认为何平的这一表述十分切中要害:“文学出圈,不仅仅是审美下沉,取悦大众,削高就低;而保卫文学圈子,也不是保卫所谓精英居高临下的‘圈地自萌’和狭隘的文学趣味,而是圈子里自由的公共空间,生长性的审美尺度和标准,以及保有持续探索激情的文学创造力。”甚至在何平此文的表述基础上,我们不妨

再作一延伸:我们优先要做的不是“贩卖文学焦虑”,而是坚守“文学直觉和审美判断”、淬炼我们的专业本领乃至职业良心——文中提到的那种热切赤诚的“气氛弥漫”,首先要存续(甚至重建)于文学界内部,然后它才有可能走向广阔的公共空间。

与文学创作类似,文学理论评论的持续发展,也需要内在生命力和自我话语范式的不断“再创造”。2024年9月召开的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闭幕式上,杨辉以文学评论家代表身份发言,重点阐述了文学评论与中华文脉、文化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落实于文学批评上,既需要克服‘以西律中’的思维惯性,确立以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为核心,融通古今中西的文化和理论视野,也需要以此为基础,建构文坛的中国话语。”(《以文学批评参与当代文化创造》,《文艺报》2024年9月4日)文学理论评论的本体意识、本土意识,以及话语范式更新,近年来被持续讨论。此类研究实践亦见2024年《文学评论》“建构中国自主的文学知识体系”专栏、《文艺争鸣》“强制阐释论”研究专辑等。文学研究的对象材料和路径方法,同样非常重要。对各类文学史料(包括口述史等)的收集研究,继续得到重视、多有成果(如《南方文坛》推出“手稿学”研究专题)。就研究路径而言,张清华继续在《当代文坛》主持“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栏目。王尧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去熟悉化”的若干思考》(《当代文坛》2024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要以“去熟悉化”的方式对文学研究中习以为常的观念、方法、逻辑和论述进行“再思考”。方法性的启示也不局限于狭义的文学领域——张柠在《小说评论》开设的书法话题专栏“翰墨灵迹”,着眼于艺术形态流变与社会文化背景乃至时代文化精神间的互见互闻,在根子上乃是与文学研究高度相通的重要方法。

同样重要的,还有“文学人”的代际更新。2024年,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京召开,“文学新力量”成为年内备受关注的研究话题。青年文学评论家群体,也在以“同代人”的身份,与青年作家一同探索成长。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四川省作协、《当代文坛》杂志社等共同举办的“2024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学术年会”,将话题聚焦于“‘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文艺报》、中国作协网、“文学新批评”公众号等平台,推出“青年文学创作问题问答”“青年评论家共话”等栏目,参与讨论的戴玉冰、霍艳、赵依等分别来自高校、研究院所、重要文学刊物等不同平台。李蔚超在《青年批评家及新的批评共同体》(《文艺报》2024年8月28日)中认为,当下“青批”身上携带着独特的时代新质,显示出“新的文风与思想的临界状态”,观点颇具代表性。学术界对最新的文学评论力量也多有扶持。《扬子江文学评论》评出首届“《扬子江文学评论》青年学者奖”、《当代作家评论》启动“新时代‘文学批评新人’培育计划”,都显示出推举文学批评新人的热望与责任心。

理论热点:空间、地方、身份、性别

2024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逝世,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的“理论的时代:文本、历史与乌托邦”追思纪念会以及各类刊物及公号刊发的纪念文章等,都让人经由詹姆逊与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交集往事,回忆起曾经那个“理论的黄金时代”。在詹姆逊的理论体系中,“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空间”正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界的重要关注点。行超在《从“无尽永前”到“无界永在”——试论近年文学写作的空间转型》(《上海文学》2024年第7期)中认为,在“70后”以降的几代作家笔下,空间叙事已经历了时间叙事,“在当下的文学书写中,作家们更有意建构的是个体的生命空间,而非作为一种历史链条下的时间谱系”。这在根本上与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强势崛起有关,而在更加直观的层面,还关联于文学中“地方性”与“地域意识”的再发现:“以上感受,首先来源于近年来文学界讨论度极高的地域文学,以及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地方’的再次崛起。”“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派”……近年来诸多较有影响的文学命名,都与“地方”有关。

北京出版集团主办的《北京文艺评论》2024年正式创刊,新的文艺评论平台不断出现。《北京文艺评论》推出“争夺‘地方’”栏目。曾攀认为:“‘地方’已然成为一种正在生成中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当代理念”(《作为方法的“地方”》,《北京文艺评论》2024年第2期)。从2024年第1期开始,《当代作家评论》开设了“新东北·新南方”栏目,“力图在‘两新’文学比较和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视野中来理解和评判‘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文学’”(韩春燕《作为现象的“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1期)。蒋述卓、唐诗人主持的《广州文艺》“新南方论坛”2024年以“关键词”和“跨界对谈”等方式继续将研究具体化,并在年末迎来了这一持续三年

栏目的总结性收官。在地域和地方话题上,杨庆祥《“新派派”写作:基于历史和当下的文学提案》(《江南》2024年第4期)中的提醒是值得注意的:对文学地方的强调,一定要挣脱“中心/地方”思维结构下的权力想象束缚,“要试图超越内部和外部的双重依附,以此来推进现代汉语写作的多元性和自主性”。更尖锐的反思也正出现,如认为地方性概念命名属于“旧武器翻新”,“地方性、区域性文学概念与话语在当代文学领域的泛滥,大概是这个行当思考力萎缩、创造力衰退的表现”(方岩《地方性的皇帝新衣》,《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韩松刚刚犀利地提醒,泛滥的命名容易将“地方”变成空洞且功利的俗套,“‘地方’正在被进行着新的图解,这种图解或者被夸大,抑或被遮蔽,但唯独不能成为地方本身了”(《空洞的“地方”,以及沦为一种空谈的“地方文学”研究》,《北京文艺评论》2024年第2期)。

同样具有讨论乃至争论空间的热点话题,还包括文学写作的主体身份想象(背后是经验想象)问题。何同彬在2024年有一段受访视频流传颇广,视频里他以脱口秀般的风格讲到,“现在很多小说写得很昏聩”“我看得都要疯了……他是太不了解年轻人了”。“昏聩”二字被咬得抑扬起伏、一度洗脑我多日,大概也准确地咬在了许多研究者的心头“槽点”上。怎样才能不“昏聩”?怎样才能让文学重获对时代生活最真实的“了解”?被提出的方案之一,便是关注那些“野生”的、来自更广义生活现场的创作能量。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新大众文艺”,另一个受到关注的概念是“素人写作”。《扬子江文学评论》刊出“素人写作”研究专题,项静认为,“素人写作”提供了“独特的经验和故事”以及“普通人视角和情感精神上的共鸣”,其朴素简洁、言之有物的艺术风格,为当下写作“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参照系”(《素人写作:时代文体与经验的公共性》,《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5期)。何平则提醒,“何人为素”或许是非常暧昧的问题,我们要警惕这种身份想象被异化成营销陷阱(《写作者的身份证姓名》,《北京文艺评论》2024年第1期)。与“野生”相对,“专业”提供了另一种身份想象。创意写作获批二级学科,《当代文坛》开设“创意写作研究”专栏,其中黄平《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创意写作的传统、现状与未来》、冯进《“爱荷华经验”与中国大陆的创意写作学科》等文对创意写作国内外的历史传统和学科样本进行分析。张清华则撰文强调,“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归根结底是在培养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精神,这个社会就不健康,这个文明体系就不健全”(《“中文创意写作”地位的确认有何现实意义?》,《文艺报》2024年3月4日)。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也举办了“问题与方法:中文创意写作的教学实践与学术研究”青年论坛。但我们有时也会听到质疑的声音:例如,从教室直通文坛的“订制渠道”,会不会导致写作者与生活本身的隔绝?甚至,这条赛道会不会内卷成各大高校间的“拼资源”游戏,以致加剧文学界内部的“近亲繁殖”,令行业圈层更加固化、窄化?如何发挥扬长、规避风险,显然需要我们持续思考、久久为功。

最后还要提及“性别”议题。“女性主义”或更广义的“女性文学”研究,在2024年继续输出着有力的声音(如张莉策划的一系列相关文学实践)。在此,学理性的综述我不再展开,倒是想聊一桩周边“花絮”,那就是网络上关于“老登文学”的争论。由电影事件引发的“老登艺术”(大致可理解为“直男气息冲天”)之说,迅速蔓延至文学和哲学领域,“豆瓣”上还有人发起了“第一届老登文学奖提名”,惨遭批判的作家包括海明威、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老实说,我自己对身边某些“登里登气”的人与为文,确实极其反感;但另一方面,对于拿当下观念甚至个人趣味搞一刀切、无差别攻击诸多经典作品的做法,我又决然不能认同。在网络话语场上,偏激偏颇的艺术评判从来都不能也不必杜绝。但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显然并不严谨、高度情绪化的“网络评论话语”,其社会传播度乃至话题生产力,却又远高于核心期刊文章。这背后是一种“评价权旁落”的危机:固然“经典化”是专业文学评论的主方向和主战场,但如果完全无视传播之维、只顾自产自销,那么不专业、甚至不理性的声音必会占据时代文化生活现场,随之而来的便是公众审美趣味、社会文艺生态的逐步败坏,所谓的象牙塔领域也终难幸免。说得更具体一点,如果我们不能(或不愿)既专业又生动地讲清楚托尔斯泰的伟大,那么或许真会有更多人相信托尔斯泰和他的作品是不必阅读的“老登文学”。归根结底,文学评论是一件专业的事,但专业的最终目的不是“自闭”,而是更好地、更有尊严和分量地向公共话语场敞开——我们急需那种把公理价值、专业知识、传媒表达三者结合起来的话语能力,至少就目前来说,我们做得还不够好。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研究中心副处长、副研究员)